

难忘的 1945 年

主持全军训练工作

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
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对新闻界的冲击

国务院政研室和 1975 年的整顿

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

我的祖父孙中山

中共党史资料

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中 央 档 案 馆

61

总第六十一辑

1997 年 3 月出版

D239
6:49

98580

中共党史资料

第六十一辑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
中央档案馆 编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1997年·北京

主 编:韩泰华

副 主 编:杨公之
陈 夕

本期责编:陈 夕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共党史资料 第61辑/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. -北京:中共
党史出版社,1997.3

ISBN 7-80136-082-6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中国共产党-党史-资料 IV. D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06306 号

中共党史资料(61辑)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

中 央 档 案 馆 编

出版发行:中共党史出版社

通讯处: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:100091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

电话:(010)62581570 传真:(010)62581532

经 销:新 华 书 店

印 刷:北京春雷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7 印张 160 千字

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3000 册

ISBN 7-80136-082-6/K·72

定 价:6.00 元

DF194/26

目 录

回 忆 录

- 难忘的 1945 年 李 新(1)
主持全军训练工作 萧 克(32)
中共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李 锐(54)
“文化大革命”初期对新闻界的冲击 穆 欣(91)

专 题 资 料

- 博古与《解放日报》的四年 陈 夕(127)
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 1975 年的整顿 程中原(137)
邓小平支持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(159)

文 献 资 料

- 致陈乔年等的一封信 王若飞(170)

人 物 介 绍

- 我的祖父孙中山 孙穗芳(172)
祖父郑洞国的一生 郑建邦(175)

译文选登

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

(1945.12—1946.1) 陈春华 译(193)

新书选介..... (220)

难忘的 1945 年

李 新

一、太岳区所闻

1944 年冬,大约是十一二月间,我随刘锡五到太岳区巡视工作。刘当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部长,我是组织科长。到太岳区后,我到阳城等县的乡村去调查;他留在区党委听各地来汇报,有时也就地作些调查。

在阳城的时候,听说王震、王首道的南下支队从延安出来,经过太岳区过黄河,到豫西,往南边去了。群众传说南下支队过河时,天老爷保佑,河水全结了冰,部队徒涉而过,非常顺利。这是因为河南人民对汤恩伯十分痛恨,认为他是“河南四荒:水、旱、蝗、汤”的老总。日本打来,他就跑了。而老八路是神兵天将,这时来救老百姓,所以天老爷特别保佑他们。从这个传说,可见当时民心的向背。听到这个传说不几天,刘锡五就给我来电话,要我赶快回安泽,到区党委去听重要传达报告。

作传达报告的是区党委的代理书记王鹤峰。他说:党中央认为目前抗战的形势很好,所以特别组成南下支队,以三五九旅为基干,王震为司令员,王首道为政治委员,

要从豫西经鄂、湘直到桂、粤，筑一道长堤，防止蒋介石由峨嵋山下来，从三门峡、三峡抢夺抗战胜利果实。同时，还由王树声、戴季英率两千余人到河南开展工作。

二、赶回北方局

听完王鹤峰的报告不几天，刘锡五就告诉我，邓小平有电报来，要我们赶回北方局。

1945年1月，我随刘锡五回到山西辽县的麻田镇，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从1940年就一直住在这里。回到北方局，看到了中央发来的电报，要北方局加强对冀鲁豫工作的领导。

中央的电示指出：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，人口将近两千万，超过太行、太岳数倍。是敌后最大的根据地。但减租息大半尚未进行，各项工作尚未走上正轨，群众基础还不巩固。黄敬（当时任中共平原分局书记）又因病离职。为此，北方局即应进至冀鲁豫根据地工作，并从太行、太岳抽调一批对减租减息工作有经验、作风又好的干部到冀鲁豫，帮助发动群众，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。北方局必须亲自抓平原工作，至少半年至一年。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仍留太行。随后，中央又通知：北方局去平原工作期间，山东分局、晋察冀分局、河南区党委由中央直接领导；太行、太岳两区党委仍由北方局就近领导。

根据党中央的指示，邓小平立即率领北方局全班人马南下中原。

自 1939 年我率西青救(西北青年救国会)第二剧团到前方后,即在太行山吃小米,我心里是多么地盼望有这么一天,八路军南下平原,实行反攻,把日寇驱逐出中国啊!现在,这一天果然来到了!我兴奋得晚上不能入睡,从延安到太行的一切经历,像电影一样,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浮现。为安定心情,我依《水龙吟》词调写成了这首词的上阕:

“延安万古流芳，
延河送别多悲壮！
挥戈东渡，滔滔黄水，排空浊浪。
高举红旗，仰天长啸，太行山上。
望长城烽火，中原离黍，
凝眸处，增惆怅。”

一想，这样写不对，我这时还有什么惆怅呢？惆怅，那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不是高兴得觉都睡不着吗？应该改写。正想如何改写，想着想着，一睁眼，天大亮了。于是，赶快收拾东西，准备起程。

三、直下中原

大约在 1945 年春节前，邓小平率领中共北方局全班人马，由太行山上清漳河畔著名的麻田镇起程，浩浩荡荡，直奔已被日寇铁蹄蹂躏将近 8 年之久的华北大平原——中原。当时所谓的全班人马，其实并没有多少人。因为自从 1942 年 5 月日寇大“扫荡”使我们遭受严重损失

以后，北方局进行了大精简。组织部除部长刘锡五外，只有部员两人、干事一人。两个部员即干部科长郭森和组织科长李新；一个干事即周金光。而郭森是从冀南调来的，成立平原分局时已回冀南去了。周金光似乎也走了。所以这次南下，就只有刘锡五和我两人。宣传部除部长李大章以外，只有部员朱穆之等二三人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朱穆之并没有随李大章南下。统战部和政权工作部自5月“扫荡”、张友清被俘和张衡宇牺牲后就没有再恢复。青委的江明早已离开，周惠则到太岳区担任了士敏县县委书记。妇委自蒲安修随彭德怀去延安后，似乎也没有人了。秘书处只有处长陈鹤桥随行，卓琳是否随邓小平一起南下我已记不清了。交通科的人较多，大概有十来个人，但他们有任务，是不能走的。城市工作部的人也是不能走的。为了到平原去加强群众工作，又从太行区把彭涛调来，从太岳区把周惠调回，是否还有其他人，印象也模糊了。不过最多也不过两三人而已。总之，这次的全班人马，大约有十多个干部，但因有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、刘锡五和李大章，在当时情况下，其声势确也是很浩大的。何况还有护送的部队呢。

这次南下中原，一路顺利。一方面是因为有部队护送（但护送的部队不多，所以我已记不清是哪个部队了）；另一方面，也是主要的，是因为1942年以后，我们对敌占区的工作加强了，许多伪军据点，都是两面派，对我们通过，并不阻拦。这同1942年我率领青委巡视团，随邓小平、戎子和到冀南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。那次过平汉路没有成

功,返回时还遭到日寇的袭击。这次通过不少敌人的沟垒,但没有听见敌人的枪声,如入无人之境。尽管日寇1944年经过豫湘桂战役,打通了大陆交通线,但从敌占区的情况看来,中国人心不死,“中原父老望旌旗”,我们的反攻,现在虽然还是局部性的,但最后的胜利已经是不远了。

一踏到平原的土地,我们就欣喜若狂。抬头一望无际,尽是麦田,而且每天都吃白面,这和太行山相比,真有天壤之别。每天一大清早,太阳就出来了,要很晚很晚,太阳才落下去;而在太行山则要很晚才看到太阳,很早太阳就被山遮住了。似乎平原的一天要比山区长得多。不过仔细一想,平原的同志们坚持抗战多么艰苦啊!他们每天都盼望早些天黑,晚些天明,他们真是度日如年。这时我们就觉得太行山可爱了。要没有太行山,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,不知要困难多少倍呢。

不几天,我们就到了濮阳。当时,中共平原分局就设在这里。

四、在濮阳的争论

我们到濮阳后,受到平原分局同志们的热烈欢迎。邓小平对分局干部的讲话,也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。邓说:当前革命形势很好,抗战胜利已不成问题。但必须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,必须防止蒋介石抢夺和独占抗战胜利果实。为此,中央已派王震率部南下,从豫西、

鄂西以至湘赣、桂粤，在平汉路西修一道大堤，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从三门峡和三峡涌出来。这就像古代修筑万里长城一样，防止敌骑南下，到中原来抢夺秋收果实。今天，中央又要我们到冀鲁豫来，帮助你们巩固和扩大解放区，并向南和新四军的五师、四师打通联系，又在平汉路东再修一道长城，或叫再筑一道大堤，防止蒋介石那股祸水泛滥。黄水在中原是经常泛滥成灾的。蒋介石也和黄水一样，你们这里不是叫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吗？汤恩伯去年被日本人打垮了，我们就是不许他再回来。中原人民是最善于筑堤防水的，现在我们对付蒋介石，说像对付黄水为患一样，这叫做“筑堤防水”。邓小平很会讲话，讲得既深刻，又生动，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和掌声。

随后是分局和各地的同志们来向北方局汇报工作。汇报的中心是发动农民，主要是减租减息工作的情况。这时冀鲁豫各地正在开展“雇、佃、贫运动”。何为“雇、佃、贫”？就是雇农、佃家和贫农。当时冀鲁豫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，搞得很“左”，只强调雇、佃、贫，不注意团结中农，甚至对中农连提都不提了。我们这些从太行、太岳来的人，见此当然感到不安。因为现在还在抗日嘛，地主、富农、开明士绅都要团结，怎么连中农都可以不要呢！但是，他们这里的群众运动确是搞得轰轰烈烈，邓小平、刘锡五、李大章不好说话。彭涛是太行来的，周惠是太岳来的，说话也有顾虑。于是他们都推着我出来讲话。那时，分局书记黄敬因病到延安去了。代理书记宋任穷又到前面管军事工作去了，分局管群众工作的是张霖之，驻

地濮阳的地委书记(或副书记?)是赵紫阳,地青委书记是纪登奎。在汇报和讨论中,平原方面主要是他们三人发言,他们都一致支持说雇、佃、贫运动正确,尤其是纪登奎,分局驻地就是他在那里“坐村”。他讲得很生动,很动听,坚持雇、佃、贫也最坚决。纪登奎是我在北京局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学生,所以这次从北方局来的人都认为我出来说话最合适。刘锡五还专门为此和我谈过话。我自己也觉得应该说话了。

一到濮阳,我就注意到驻村去了解群众生活情况。会议开始后,我是白天开会,晚上到群众中作调查。尤其是大家要我发言后,我更深入地作了专题调查。经过深入的了解,我发觉这里雇、佃、贫运动,表面上轰轰烈烈,实际上强迫命令很严重。群众每晚上听见敲钢轨的声音(当地群众把破坏铁路拉回来的钢轨吊在树上,敲击它便是号令群众集合的钟声),便跑步赶往会场。就连小脚老太太也都提着马扎,一歪一扭地赶着去开会。会场上鸦雀无声,秩序井然,就像我们的正规部队集合时那样的严肃。我一看到这种现象就怀疑,经了解,果然是强迫命令的结果。雇、佃、贫农,社会地位低下,很容易接受强迫命令。当他们被组织起来,连中农也不要,就感到很孤立,便一心依靠八路军共产党。而经过减租减息,特别是通过清算退租,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,便又骄横起来,更不注意团结全村中农以上的群众。这样的地方,如果日寇再来,要建立伪组织是很容易的。

我把情况了解清楚后,便在会上作了一次长篇的发

言。我根据太行的经验，说明强迫命令不能真正发动群众。说明不团结中农，不争取一切阶层抗日，是经不住战争考验的，由此证明中央既依靠基本群众，又注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。而且，基本群众就包括中农在内，只要雇、佃、贫，就会脱离相当多的群众，就会孤立，群众感到孤立，就不会自觉地起来，那就只会是强迫命令了。这时我把调查到的材料，把驻村的真情况讲了出来，到会的人都大吃一惊，谁也无话可说。纪登奎虽然不服气，有时争了几句，但在事实面前，尤其是在中央明确有政策面前，他也只好忍着不说话了。

最后由邓小平做总结。他首先肯定了平原分局的工作成绩，称赞军队打胜仗，扩大了解放区；地方干部特别辛苦，支援了战争，也发动了群众。在平原地区的地方干部，坚持抗战是很不容易的，我们要特别关心他们。然后着重谈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。他说：在敌后，只有依靠农民，才能坚持抗战，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。要依靠农民，就必须减租减息，要减租减息，就得依靠雇、佃、贫，冀鲁豫的同志们着重发动雇、佃、贫是对的。但是，今天是抗日战争，不是土地革命，一定要把中农团结好，同时还要注意统一战线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。就是搞土地革命，也是要团结中农的。从前“左”倾路线的错误，就是没有注意团结中农。太行、太岳在发动群众中注意团结中农，有好的经验。总之，我们是来帮助冀鲁豫同志们做工作的。首先，太行、太岳的同志要向这里的同志们学习，这里的同志们也应该学习太行、太岳的经验。现在，我们开始局部

反攻了，不久就会大反攻，抗战就会胜利。但是，同志们切勿骄傲，一定要虚心，要团结，争取胜利早日到来。邓小平的总结，面面俱到，一场争论，就此结束，大家都感到满意。

五、难忘的奇遇

在濮阳，我还有过一次终身难忘的奇遇。

群众为了欢庆春节，特地请来大戏班唱戏。濮阳虽属河南，但地近山东，群众的性格豪迈粗犷，颇有水泊梁山的英雄气概。集上人们喝大碗酒，吃大块肉。唱戏时声音高亢，尤其是花脸，力竭声嘶地大喊大叫，令人震耳欲聋。

那天我看戏看得正带劲的时候，忽然有人从身后往我肩上一拍，蓦地回头一看，原来是“死鬼”彭梦庾，叫我大吃一惊。我定睛细看，不错，这不分明是活生生的“清谈家”吗？我们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许久才放开。这时，我开玩笑地问他：“你不是老早就‘万岁’了吗？今天不能来找我去替死呀！”他轻轻地给了我一拳，于是大家都哄笑起来。这一幕情景，至今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际。

我和彭梦庾 1940 年一起在北方局青委工作。我担任青训班主任，他当副主任，亲如兄弟。我俩都是四川人，爱吹牛，彼此戏称“清谈家”，别人也都这样称呼我们。1942 年 5 月“扫荡”时，他被俘了，传说他与张友清一起被敌人杀害时，高呼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其实他被俘后押往太

原，敌人审问时，他故意说是河北南宫人，因为他巡视工作时到过南宫，熟悉那里的情况，并学会说几句那里的话，因此连翻译都被他骗过了。这次审问，凡说是南方人的都被认为是老红军给杀了。张友清因为是中共著名人物，敌人有他的照片，所以也被杀了。彭后来被送往东北作苦工，在黑龙江挖煤矿。在听到又要把他们送到日本作劳工时，他联络了一部分可靠的人组织暴动。暴动虽然成功，但逃到森林里无法立足，于是便分散了。他找到一个地主家当长工，这家人有爱国思想，尤其是那位大少爷是个学生，很同情抗日军队。后来便是在他的帮助下，彭梦庾才能够和一个难友（一二〇师宣传队副队长？）一起回到石家庄附近那位难友的老家。经过打听，他们知道北方局已到濮阳，于是那位难友故意带上他的小侄女，一起赶到濮阳来。那个小女孩不过十一二岁，很机灵，我故意装成敌伪人员来考问她，她回答得一丝不漏，因此我相信他们一路上是很顺利的。

上述情况，是我和彭梦庾谈话后得知的。我向刘锡五做了汇报。锡五说：在前方不便审查。送回延安去吧。在延安，对他这种传奇式的经历也无法做结论。后来到了东北，张闻天经过认真调查，证明他所谈属实，肯定了他们的斗争，恢复了他的党籍，并任命他担任了黑龙江省的一个县委书记。全国解放后，他调到江西工作。江西省长邵式平很赏识他，让他当了省政府的秘书长，同时还是省委的秘书长。他这时在江西真是红极一时，曾几次邀我到庐山去游览，但我都因工作繁忙，未能如愿。一直到今天，我

也未曾亲上庐山，很可能是一生的憾事。
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彭梦庾这个江西的大“走资派”当然在劫难逃。但他却善于躲避，造反派很难捉住他。有一次造反派追到庐山来逮他，他实在无处躲藏，便躲进了毛主席的住所。造反派明明知道他躲在毛主席那所特别的庭院里，但谁也不敢闯进去，因此得免于难。
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他被周惠邀到内蒙古任自治区副主席。后来又回到东北工作了一段之后便离休了。去年秋天，因跌交倒在地上便仙逝了。听到他的噩耗，我不胜悲悼，现在提笔写到这里，一想起我们在太行山上的真挚友情，我的手便止不住发抖，无法再写下去了。

六、赶赴豫东

在濮阳没有住多久，彭梦庾就起身往延安，我也就起身赶赴豫东去了。

这时北方局决定在平原分局下面，设立一个豫东区党委，辖十二地委和十三地委，十二地委在水东（黄河改道后黄泛区的东面），十三地委主要在水西。我记得区党委书记是戴晓东，组织部长是王一心。其余的人事安排我已记不清楚了。我现在看到的党史材料，有关豫东区党委的事竟一字也没有。我相信经过认真查考，豫东区党委成立的经过和它的活动情况，总可以搞清楚的。

我到豫东，是刘锡五和我谈的话。他说北方局决定新成立一个豫东区党委，因缺干部，要把王一心从太岳调到

区党委当组织部长，把你调去担任十三地委副书记。现在王一心还没有到，你可随部队先走。王一心到职后，由他和你再联系。王原来是北方局组织部的干部科长（刘尚志之后，郭森之前），我们曾共事两三年，非常熟悉。因为形势发展很快，部队走得很急，我也赶紧跟着离开了濮阳。这时十三地委在水西，我也随部队过了黄河。但刚一过黄河，又接到通知，要我赶快到水东去。我于是离开部队，由地下交通带领着再渡河东去。经过黄泛区到了水东的中心区杞县。

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内，我两渡黄河，并且经过黄泛区，使我对黄河两岸人民的苦难，有了初步然而十分深刻的了解。那一带的人民群众，居无定所，随时迁徙。所谓房屋，只不过四根砖柱，另外有一只小船，系在一根砖柱上。黄河水来了，一家人就到船上住，等水涨过砖柱，他们就驾着小船，四处飘流，随遇而安。等黄河水退了，他们又回到老家那四根砖柱内居住。因为砖柱上刻了字，所以能各回各的家。各家的土地，也可以从砖上的字，按方向、距离和面积测量出来，毫无差错。一般情况下，黄河是秋后退水，人们可以赶回家去种麦。他们种麦的方法很简单，前面一个人拉着犁走，后面一个人用手把麦种放进那浅浅的犁沟里面，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“犁沟麦”。因为泛滥的河水淤成的泥土很肥沃，所以“犁沟麦”的收成很不错。不过要早种早收，种迟了或收迟了就有被河水淹没的危险。这一带人民主要就靠这一季麦收过日子，实在穷得可怜。家里什么也没有，穿着之破烂，看起来都像乞丐一般。